

藝 衡

第二輯

策 划：谢福文
主 编：徐鼎一
副主编：杨一家
柳春蕊

藝衡

第二輯

策 划：谢福文
主 编：徐鼎一
副主编：杨一家
柳春蕊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艺衡. 第2辑/徐鼎一主编.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 12

ISBN 978-7-5013-4223-5

I. 艺… II. 徐… III. 传统文化—中国—文集 IV. G12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35890号

顾 问	文怀沙 冯其庸 程大利
编 委	杨一家 柳春蕊 徐鼎一
	谢福文 赖洪喜 潘建国
书 名	艺衡 第二辑
策 划	谢福文
主 编	徐鼎一
副 主 编	杨一家 柳春蕊
出 版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发 行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七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书名题字	文怀沙
责任编辑	耿素丽
特约编辑	蔡金存 樊 怡 耀文星
版式设计	萧 泉
印 刷	深圳华新彩印制版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mm 1/16
印 张	13
版 次	2009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3-4223-5
定 价	48.00元

【学苑】

- 1 续白鹿洞学规 胡居仁
7 项羽不死于乌江考（外一篇） 冯其庸
30 中国古典诗歌的多义性 袁行霈
40 水不流花不开的世界 朱良志
55 问题与方法：经典体系的建立与统绪 邓曦泽
78 方东美的中国哲学叙述中的几个基本概念 颜玉科
90 《古文辞类纂》解题及其读法 钱基博
101 读陶渊明《桃花源记并诗》札记 曾祥波

【经苑】

- 104 诸儒论读经
108 经学概论讲义 王国维著 童岭整理
114 马国翰辑郑玄《孟子注》疏误举正 李峻岫
117 《五经正义撰定答问》疏证 [日本] 铃木虎雄撰 童岭疏证

【诗苑】

- 123 南湖藏书楼记 龙协涛
124 《惕斋诗存》序 张宏生
124 送成田君燕行序 陆胤
125 南轩文选 柳春蕊
131 北行吟笺 金鉴才
132 衔月楼近稿 古求能
133 诗作六首 陈品鑫
134 戊子存稿 林阳
134 甲申以来诗词存稿 程羽黑
136 箫泉题画诗稿 蔡金存

【书画苑】

- 137 王时敏绘画及「画家正脉」说之理论根源与借镜意义 徐鼎一
150 习画山水自述 冯其庸
160 妙虚法师绘画作品
166 易峰的花鸟画 傅京生
170 陈复澄书法作品
174 《历代名画记》与写意画风的演化 杨一家

【收藏苑】

- 182 孟子《圣迹图》版本考 潘建国
196 清儒书翰二题 乙斋
203 浩封夫人陈老伯母黄太夫人六旬大庆寿序 李文田撰 许庚身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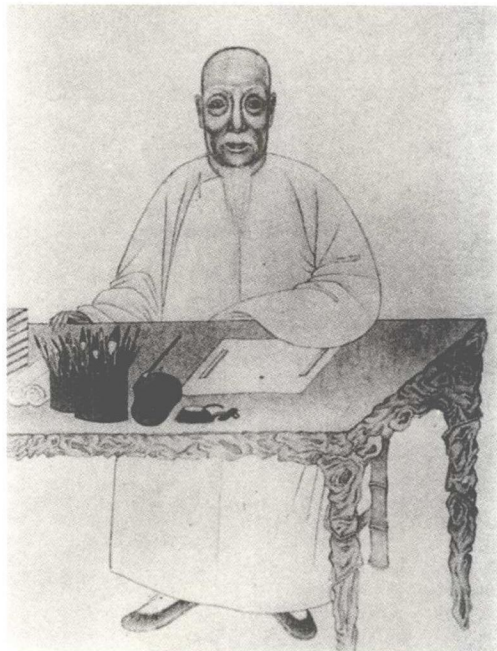
续白鹿洞学规

胡居仁

正趋向以立其志

书曰：惟狂克念作圣，惟圣罔念作狂。人求多闻，时惟建事，学于古训乃有获。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子以四教：文、行、忠、信。颜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成晌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公明仪曰：文王，我师也。周公岂欺我哉。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又曰：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曰：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周子曰：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伊尹、颜渊，大贤也。伊尹耻其君不为尧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挹于市。颜渊不迁怒，不贰过。志伊尹之所志，学颜渊之所学。过则圣，及则贤，不及则亦不失于令名。圣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德行，行之事业。彼以文辞而已者，陋矣。程子曰：天下第一等事，不可让与别人做。程子自十五六，遂厌科举之学，慨然有求道之志。古人惟务修德而已。有德者必有言。韩退之因学为文，而求其所至。是倒学了。言学，便以道为志。言人，便以圣人为志。吕氏称程子宁学圣人而未至，不欲一善成名。横渠先生曰：二

程自十四五，脱然便学圣人。横渠张子语学者曰：孰能少置意科举，相从入尧舜之域？关中学者，翕然从之。多告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学者必如圣人而后已。尹氏曰：吾学圣人者也。圣人所言，吾当言之。圣人所行，吾当行之。故力排异端，以扶正道。陈忠肃公曰：幼学之士，先要分别人品之上下。何者是圣贤所为之事，



胡居仁小像

何者是下愚所为之事？向善背恶，去彼取此。此幼学所当先也。朱子曰：为学须思所以超凡入圣。如昨日为乡人，今日便要为圣人。须竦拔后，方始有进。今日克念，即可为圣。明日罔念，即为狂矣。古之学者，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为学先须立志，志既立，然后学问可次第着力。立志不定，终不济事。世之志利欲者与志理义者，自不干事。志利欲，便是趋禽兽之径；志理义，便是正路乡里。熹于科举，

自幼便见得轻。今人不去讲义理，只去学诗文，已落第二等。学莫先于立志，志道则心存于正而无他。圣人教人，无非讲明义理以修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此道理与生俱来，今人弃了都不理会，浮生浪死，甚可惜。南轩张先生曰：学者当以立志为先，不为异端惑，不为文采眩，不为功利汨，庶几可以言读书矣。

愚谓圣人设教，无非因人固有之理而品节之。使由是而学焉，则德无不明、身无不修矣。今之学者，有气高者，则驰骛于空无玄妙之域；明敏者，类以该博为尚，科名为心；又其下者，不过终于诗句浮词，以媚世取容而已，未尝知有圣贤之学也。夫圣贤之学，得之于己，可以成善治、美风俗、兴教化，三代可复也。或者以为圣人之道，高远难至，非后学之所敢及。殊不知有生之类，其性本同，但圣人不为物欲所昏耳。今学者诚能存养省察，使本心常明、物欲不行，则天性自全、圣人可学而至矣。圣人岂隐其易者，反使人由于艰难阻绝之域哉？又有以为道学固美，但非世俗所尚，不利行耳。殊不知日用之间，无非此道之流行。近自洒埽应对事亲接物之间，推而至于仁民爱物，无所用而不周，无所施而不利，特由教养无方，人自不察耳。居仁不揆愚陋，窃有志于斯焉，于是不敢自私，将欲与有志之士，讲明而践行之。故为此规，以告同类，必先开发此志，然后进于有为也。至于用力之方，条例于左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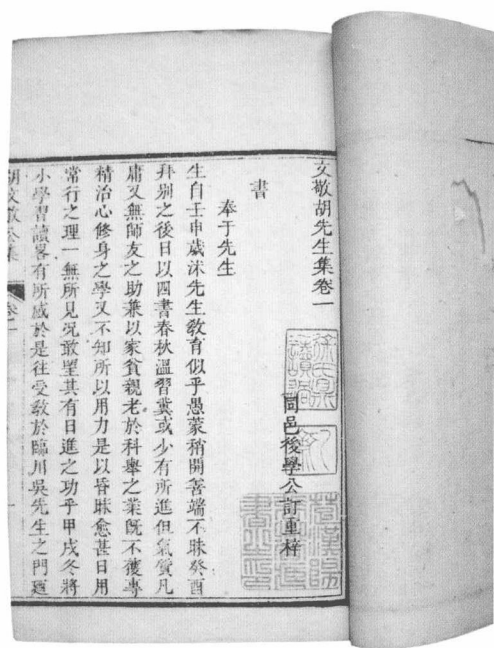


《胡文敬公集》书影

主诚敬以存其心

易曰：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诚，所以居业也。闲邪存其诚。孔子曰：主忠信。言忠信，行笃敬，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曲礼曰：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安民哉。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声容静，头容直，气容肃，立容德，色容庄。坐如尸，立如齐。庄敬日强，安肆日偷。丹书曰：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孟子曰：仁，人心也。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程子曰：若不能涵养，只是说话。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欲人将已放之心，约之使反复入身来。自能寻向上去，下学而上达也。古之人，耳之于乐，目之于礼，左右起居，盘盂几杖，有铭有戒，动息皆有所养。今皆废坏，独有理义之养心耳，但此涵养久自熟矣。敬以直内，是涵养意。吕与叔患思虑之多，不能驱除。程子曰：此正如破屋御寇，东面一人来未逐得，西面一人又至矣。左右前后，驱除不暇。盖其四面空疏，盗故易入，无缘作得主。盖中有主，则外患不能入，自然无事。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是彻上彻下语。圣人元无二语。学者当守此心，不可急迫，当栽培深厚，涵泳于其间，然后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意，终不足以达道。思无邪，毋不敬。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今人心主不定，视心如寇仇，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孔子言仁，只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气象，便须心广体胖，动容周旋，自然中礼。惟慎独便是守之之法。君子修己以敬，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惟上一下一于恭敬，则天地自位，万物自育，气无不和，四灵何有不至。此体信达顺之道，聪明睿知，皆由此出，以此祀天飨帝。人道惟在忠信，不诚无物，且出入

无时莫知其乡者，人心也。苟无忠信，岂复有物乎。心要在腔子里。学者患思虑纷乱，不能宁静，此则天下之公病。学者只要立个心，此上头尽有商量，闲邪则诚自存，不是外面提一个诚将来存著。今人外面役役为不善，于不善中寻个善来存著。如此，则岂有入善之理。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内出。只为诚便存，闲邪更著甚工夫。但惟是动容貌、整思虑，则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则既不之东，又不之西。如是，则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只是内存，此则自然天理明。学者须是将敬以直内，涵养此意，直内是本。闲邪则固一矣，主一则不消言闲邪。有以一为难见，不可下工夫，如何？一者无他，只整齐严肃，则心便一。一则自无匪僻之干。此意但涵养久之，则天理自然明。敬，则自虚静，但不可把虚静唤作敬。学者先务固在心志。然有谓欲屏去闻见知思，则是绝圣弃智；有欲屏去思虑，患其纷乱，则是坐禅入定。如明鉴在兹，万物毕照，是鉴之常，难为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万物，难为使之不思虑。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为主，敬而已矣。有主，则虚。虚谓外邪不能入。无主，则实。实谓物来夺之。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于一事，则他事更不能入矣。事为之主，尚无思虑纷扰之患，况主于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谓敬，主一之谓敬；所谓一，无适之谓一。且欲涵泳主一之义，不一，则二三矣。至于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于屋漏，皆是敬之事。严威俨恪，非敬之事，但致敬自此入。朱子曰：敬者，圣学所以成始而成终者也。为小学者，不由乎此，固无以涵养本原，而谨乎洒扫应对进退之节与夫六艺之教。为大学者不由乎此，亦无以开发聪明，进德修业，而致乎明德新民之功也。圣贤之学，彻头彻尾，只是一敬字。致知不以敬，则昏惑纷扰，无以察义理之归。躬行不以敬，则怠惰放肆，无以致义理之



《胡文敬公集》书影

实。或问：敬字当不得小学？朱子曰：看来小学却当不得敬。敬已自包得小学，敬是彻上彻下工夫。虽做到圣贤田地，也放下这敬不得。持其志，则气自清明。学者当提醒此心，使如日之方升，则群邪自息。才主一，便觉意思卓然精明。人一时间外面整肃，便一时醒。一时放宽了，便昏怠也。敬者，一心之主宰，万事之根本。古人于小学中已自把捉成了。故于大学，无所不可。今人既无小学之功，却当以敬为本，妄诞欺诈为不诚，怠惰放肆为不敬。范氏曰：一心之微，众欲攻之。其所存者，呜呼几希。君子存诚，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体从令。西山真先生曰：敬则万善俱立，怠则万善俱废。

愚闻人之一心，万理咸备。盖其虚灵之体，得之于天。所以主乎吾之一心、宰制天下之事者，孰有大于此者乎？孰有贵于此者乎？然放而不存，日以昏昧。至大至贵之物，反流于卑污苟贱之域，而不自知矣。然所以放者，由于物欲牵引，旧习

缠绕。故杂虑纷纭，不能休息，而无时在腔子之内也。惟能主乎诚敬，则本心全体，即此而存。外邪客虑，无自入矣。盖真实无妄之谓诚，主一无适之谓敬。二者既立，则天理安有不明、人欲何从而生哉？但其功夫效验，周遍精切，非一言所能形容。是以类集圣贤所言诚敬之道，共为一篇，庶乎可以体验而有得焉。愚以为今之学者，但当尽己之心，毋使有一毫之虚妄；齐庄严肃，毋使有一毫之情弛，则所谓真实无妄、主一无适者，自可至矣。由是以穷理修身，由是以齐家治国，亦何所不可、何所不能哉？程子所谓聪明睿智，皆由此出，信不欺我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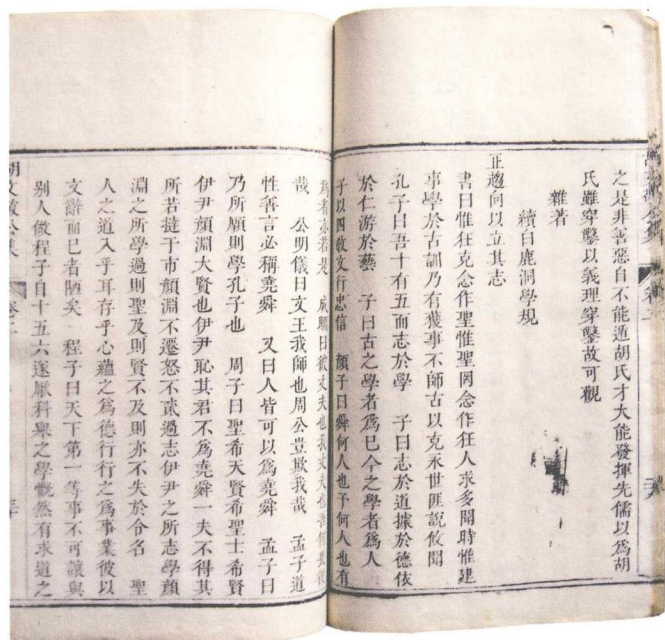
博穷事理以尽致知之方

程子曰：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凡有一物，必有一理。须是穷尽其理。穷理亦多端。或读书讲明道义；或论古今人物，别其是非；或应接事物，处其当否，皆穷理也。穷理者非谓必穷尽天下万物之理，又非谓止穷得一理便到，只要积累多后，自然见去，自一身之中以至万事万物之理会得多，自当脱然有觉悟处。格物非欲尽穷天下之物，但于一物穷尽，其他可以类推。至于言孝，则当求其所以为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穷不得，且别穷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难者，各随人浅深。譬如千蹊万径，皆可以适国，但得一道而入，则可以通其余矣。万物各具一理，万理共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无不通也。或问观物察己者，岂因见物而反求诸己乎？程子曰，不必然也。物我一理，才明彼即晓此，此合内外之道也。语其大，天地之高厚；语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皆学者所宜致思也。曰：然则先求之四端可乎？曰：求之性情固切于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致知之要，当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于慈、子止于孝之类。若不务此，而徒欲泛然以观万物之

理，则吾恐其如大军之游骑，出太远而无所归也。格物莫若察之于身，其得尤切。延平李先生曰：凡遇一事，即当且就此事反复推寻，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释脱落。然后循序少进，而别穷一事，如此既久，积累之多，胸中自当有洒然处。朱子曰：读书是格物一事。致知之方，或考之事为之著，或察之念虑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讲论之际，使于身心性情之德、人伦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变、鸟兽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见其所当然而不容己、与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必其表里精粗，无所不尽而又益推其类

以通之，至于一旦脱然而贯通焉，则于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义理精微之所极，而吾之聪明睿智，亦皆有以究其心之本体而无不尽矣。盈天地之间，皆物也，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则心之为物，实主于身，其体则有仁义礼智之性，其用则有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情，浑然在中，随感而应，各有攸主而不可乱也。次而及于身之所具，则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于身之所接，则有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常，是皆有所当然之则，自不容己。所谓理也，外而至于人，则人之理不异于己也；远而至于物，则物之理不异于人也。极其大，则天地之运，古今之变，不能外也；尽于小，则一尘之微，一息之顷，不能遗也。

愚谓大学之教，以致知为先，盖能推致吾之知识，使无不尽，则本心洞然，万变毕照，由此而之焉，则意诚心正而身修，天下国家可得而治矣。但其用力之方则在于即物推求以究其理，方为的实。若泛然从事于



《胡文敬公集·续白鹿洞学规》书影

言语训诂之末，则讲说虽勤，文辞虽丽，乃程子所谓玩物丧志之学，徒弊精神，于身心无纤毫之益。其遇事变，亦茫然不知理之所在，颠倒错缪，殆有甚焉，尚望其能成己成物而无误乎，然亦无以他求为也。今学者诚能读圣贤之书，反复寻究，以求其理，亦可以得致知之大端矣。更于日用之间穷其何为是、何为非，事事求其至善，物物寻其当然，则致知之功，莫切于此。如此既久，则知益明、理益精矣。

审察几微以为应事之要

易曰：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知几其神乎。诗曰：潜虽伏矣，亦孔之昭。中庸曰：故君子内省不疚，无恶于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见乎。子思曰：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周子曰：诚无为，几善恶。朱子曰：欲动未动之间便有善恶，正学者用心理会。天理人欲几微之间。天理人欲之

分，只争些子，故周子只管说几句。几微之间，善者便是天理，恶者便是人欲，才觉如此，便存其善，去其恶，也可。

愚谓人生日用之间，起居动息，以至设施措置，不能不与物接，故不能无事，然所以为事之理，固已具于性分之内也，若厌其烦扰，欲绝而去之，则陷于老佛之空寂；若不察其理之当然，以机变为足以应事，则流于仪秦商鞅知谋之末，为小人之归矣。然事物之间，虽曰无非天理所在，苟失于省察，则不觉陷于人欲之私，虽或悔悟亦无及矣，故必于事物初接本心萌动之际，谨察精辨，孰为天理，孰为人欲，使善恶是非、公私义利，判然于前，然后从其善而去其恶。如此既久，则理义益精，自无过与不及之差矣。

克治力行以尽成己之道

易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书曰：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颜渊问克己复礼之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程子曰：学问之道无他也，知其不善，则速改以从善而已。人能克己，则仰不愧，俯不忤，其乐可知。有息，则馁矣。伊川问显道，相别半年，做得甚工夫。对曰：只去个矜字。矫轻警惰。朱子曰：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此间讲说时少，践履时多，事事都要人自去理会。凡是私己不是天理者，便克将去。行之久，则善与自家为一。为一，则得之在我。未能行，则善自善，我自我。人之于道理不能行，只是在我之道理有未尽耳。不当咎其不可行，当反而求尽其道。

愚闻人之有生，便有所以为人之理，是皆天之所赋，非人力之所为也。虽圣人不过尽为人之理而已。孟子所谓践形是也。非圣人于此身之外，别有所以为圣人之理也。今所以不能如圣人之从容中道者，是气质有

偏、物欲有蔽，故必克治其气质之偏、物欲之蔽。使所行无过不及之差，然后可以尽此身之理以成乎己也。苟或知而不行，则前所穷之理，无所安顿，徒费讲学之功，无以为己有，岂不重可惜乎？今学于此者，务必实体此理，而力行以终之，以脱乎俗学之陋。其力行之方，圣贤方册已详，姑举大端于此，以示同志。

推己及物以广成物之功

愚闻子朱子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有我之得私也。是以君子之心，廓然大公，其视天下，无一物而非吾心之所当爱，无一事而非吾职之所当为。虽或势在匹夫之贱，所以尧舜其君尧舜其民者，未尝不在吾之分内也。窃谓学者须要有如此心胸，则规模广大，私吝之心自消。推而行之，岂有一民不被其泽、一物不得其所哉！此儒者之学，必至于参天地，赞化育，然后为功用之全也。圣贤开示后学，深切如此，顾乃背其名教，偏狹浅陋，成一己之功名，苟一家之富贵，使明德新民之大道，正君善俗之大业，不行于世，呜呼惜哉！有志之士，尚当勉力于此，以进复先王之治。

（选自《胡文敬公集》卷二，清乾隆丁丑季春同邑后学重梓）

小传：

胡居仁，生于明宣宗宣德九年（1434），卒于宪宗成化二十年（1484）。字叔心，号敬斋，明江西余干人，理学家。师事崇仁吴与弼。饱读儒家经典，致力于程朱理学。性行淳笃，淡泊自处。与陈献章、娄谅、谢复、郑侃等人交游。主张“以主忠信为先，以求放心为要，操而勿失，莫大乎敬”，因以敬名其斋。他生活俭朴，唯以讲学为念，一日不讲学，则惕然不安。曾主讲于白鹿洞书院。著有《胡文敬公集》《易象抄》《居业录》《居业录续编》等。明万历十三年，追谥文敬。

项羽不死于乌江考（外一篇）

冯其庸

乌江自刎，这是千古流传、人人皆知的一个历史人物项羽的结局。但这个传说是否可信却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思考，甚至连史学界都一直没有予以注意，一直是沿袭旧说。1985年2月13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安徽定远一个中学老师写的文章，题目是《项羽究竟死于何地？》。他引证《史记》《汉书》的材料，结合当地的一些遗迹，指出项羽是在东城（今定远）自刎的。文章发表后，颇得到一些好评，还被多家报刊转载。现在，此事已经过去整整20年了，当时的热点也早已冷却了，事情又回复到原样。我看后来出版的有关书籍，仍旧是项羽自刎乌江。也就是说，这篇文章所提出的项羽自刎于东城的说法没有得到认可。

恰好我从1982年起，开始调查《项羽本纪》的一些史迹和地理位置，我曾调查过“下相”（今江苏宿迁，项羽的出生地）、古盱眙（项羽立楚怀王孙心为义帝处）、东阳城（东阳少年聚众起事，立陈婴为长，号为“异军苍头特起”处）等等，后来又调查过鸿沟（在郑州，楚汉相争以鸿沟为界处）、彭城（今徐州）等处。1986年我又两次调查垓下、灵璧和定远的东城、阴陵、虞姬墓，后来又又到乌江作了调查。2005年11月14日，我再次到定远调查了东城、阴陵、大泽等遗址，20年前调查过的古城遗址，现在

都已立了碑记。前一次的调查后，我脑子里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今年的这次调查，使我决心对这个问题作一番考证。

司马迁对项羽败、死的叙论

要考证这个问题，还得从最早的记录——司马迁的《史记》说起。所以还需把《史记》有关的文字全部引录下来，以便检验核证：

《史记·项羽本纪》：

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于是项王乃上马骑，麾下壮士骑从者八百余人，直夜溃围南出，驰走。平明，汉军乃觉之，令骑将灌婴以五千骑追之。项王渡淮，骑能属者百余人耳。项王至阴陵，迷失道，问一田父，田父给曰“左”。左，乃陷大泽中。以故汉追及之。项王乃复引兵而东，至东城，乃有二十八骑。汉骑追者数千

人。项王自度不得脱。谓其骑曰：“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快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乃分其骑以为四队，四向。汉军围之数重。项王谓其骑曰：“吾为公取彼一将。”令四面骑驰下，期山东为三处。于是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遂斩汉一将。是时，赤泉侯为骑将，追项王，项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与其骑会为三处。汉军不知项王所在，乃分军为三，复围之。项王乃驰，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复聚其骑，亡其两骑耳。乃谓其骑曰：“何如？”骑皆伏曰：“如大王言。”

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舣船待，谓项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乃谓亭长曰：“吾知公长者。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行千里，不忍杀之，以赐公。”乃令骑皆下马步行，持短兵接战。独籍所杀汉军数百人。项王身亦被十余创。顾见汉骑司马吕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项王也。项王乃曰：“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头，余骑相蹂践争项王，相杀者数十人。最其后，郎中骑杨喜，骑司马吕马童，郎中吕



钟离古城遗址

项羽于淮河北之垓下突围南行，过淮河，至钟离城，收集残部，随即西南行，去阴陵。今钟离城老百姓仍称此城为“霸王城”。城址仍在，实为春秋战国时之古城，项羽只是短暂的停留。

胜、杨武各得其一体。五人共会其体，皆是。故分其地为五：封吕马童为中水侯，封王翳为杜衍侯，封杨喜为赤泉侯，封杨武为吴防侯，封吕胜为涅阳侯。

……

太史公曰：……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史记·高祖本纪》：

五年，高祖与诸侯兵共击楚军，与项羽决胜垓下……（项羽）大败垓下。项羽卒闻汉军之楚歌，以为汉尽得楚地，项羽乃败而走，是以兵大败。使骑将灌婴追杀项羽东城，斩首八万，遂略定楚地。

《樊鄴滕灌列传》：

项籍败垓下去也，婴以御史大夫受诏将车骑别追项籍至东城，破之。所将卒五人共斩项籍，皆赐爵列侯。降左右司马各一人，卒万二千人，尽得其军将吏。下东城、历阳。渡江，

……

《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魏其（周定）

以舍人从沛，以郎中入汉，为周信侯，定三秦，迁为郎中骑将，破籍东城，侯，千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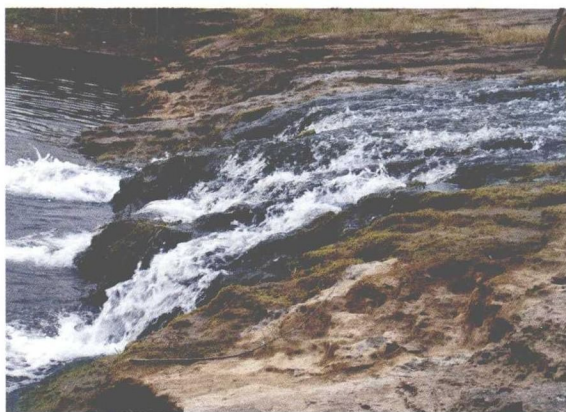
涅阳（吕胜）

以骑士汉王二年从出关，以郎将击斩项羽，侯，千五百户，比杜衍侯。

中水（吕马童）

以郎中骑将汉王元年从起好畤，以司马击龙且，复共斩项羽，侯，千五百户。

杜衍（王翳）



少十步遗迹

项羽自古钟离城西南行，经霸王寨（亦项羽短暂停留处）中九华山至靠山乡，此处有一大山涧，宽约数十米，涧石纵横，急流淙淙，涧北是一道高土岗，项羽自北向南至土岗，跃马飞过大涧，灌婴马慢，离项羽只少十步，未能追上。至今老百姓称此大涧为“少十步”。



阴陵城遗址

项羽跃马过大涧，前行，即到阴陵，今阴陵城遗址尚在。

以郎中骑汉王三年从起下邳，属淮阴，从灌婴共斩项羽，侯，千七百户。

赤泉（杨喜）

以郎中骑汉王二年从起杜，属淮阴，后从灌婴共斩项羽，侯，千九百户。

吴房（杨武）

以郎中骑将汉王元年从起下邳，击阳夏，以都尉斩项羽，有功，侯，七百户。

高陵（王周）

以骑司马汉王元年从起废丘，以都尉破田横、龙且，追籍至东城，以将军击布，九百户。

以上是《史记》中有关项羽之死的全部文字，此外如《汉书》《资治通鉴》《通鉴纪事本末》等书，也全同《史记》，故不再引。从上述《史记》有关项羽之死的全部文字中，除《项羽本纪》中有“于是项王乃欲

东渡乌江，乌江亭长檣船待”两句涉及乌江，当另作分析外，其余无一处写到项羽乌江自刎，相反，却是明确说“身死东城”（《项羽本纪·太史公曰》）。《高祖本纪》则说“使骑将灌婴追杀项羽东城”，《灌婴列传》则说：“婴以御史大夫受诏将车骑别追项籍至东城，破之。所将卒五人共斩项籍。”《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则称“破籍东城”，“击斩项羽”，“共斩项羽”，“从灌婴共斩项羽”“以都尉斩项羽”，“追籍至东城”等等，因为他们都是从灌婴追杀项羽于东城的，所以有的只简略地说“共斩项羽”，其地点当然都是东城。由此可见，《史记》里确实不存在乌江自刎之说。相反，却是用论断式的语言说：“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司马迁这样斩钉截铁的断语，以后的班固、司马光、袁枢等，都没有异辞，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

那末，《项羽本纪》“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檣船待”一段文字将作如何解释呢？

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我认为后世的误解正是从这里开始的。当然后世的误解，以讹传讹，远远超出了司马迁的这段文字，完全违背了司马迁的原意，这将留待后面详谈。现在先说这一大段文字本身的问题。

一、项羽当时所在的地点

《项羽本纪》：“项王至阴陵，迷失道，问一田父，田父给曰‘左’。左，乃陷大泽中。以故汉追及之。项王乃复引兵而

东，至东城，乃有二十八骑。汉骑追者数千人。项王自度不得脱。”

据此，项羽当时的地点是在东城，而“汉骑追者数千人，项王自度不得脱”后面还有“卒困于此”、“天之亡我”、“今日固决死”等这些话，可见项羽已困死在东城，不可能突围出去了。司马迁的这些明确的叙说，加上这个地理环境，是这一历史事件的基本事实，我们分析问题，不能离开这个基本事实作任意的猜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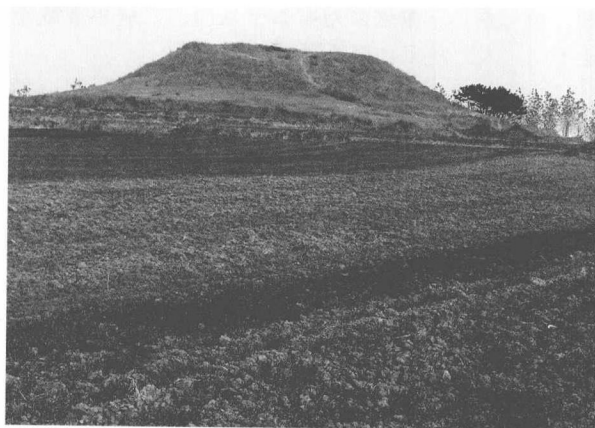
二、项王乃欲东渡乌江

这句话，是意向性的话，是想东渡乌江，而不是已经到了乌江。一个“欲”字，充分说明了它的意向性和它的未遂性。这是一。其次是“东渡”这个词。这个词既具有方向性，又含有距离感。



大泽远景

项王至阴陵，迷路，问田父，田父给曰“左”，左，乃陷大泽中。今阴陵以西仍为低洼草泽地，愈西则积为湖泊。今有窑河大桥，桥甚长，站在桥上，可见一片泽国。



虞姬墓

虞墓在东城遗址西不远处的四溃山，今二龙乡谭村。墓为一高土阜，即“四溃山”，项羽奔至此，已为汉军追上，传项羽即将虞姬之首埋于此山，故称虞姬墓，亦称“嗟虞墩”。

“东”字表明乌江在东城的东面，而且含有一定的距离。方向性加距离感，说明乌江在东城的东面，还有一定的距离（据安徽省交通部门提供的资料，东城离乌江还有240华里）。如果说项羽已经到了乌江渡口，而且渡船已在等待，项羽是站在乌江岸边，那就不是“欲东渡”的问题，而是立刻上渡船的问题了。否则他突围到乌江来干什么呢？难道还要想想要不要渡乌江吗？正是因为他还在东城，离乌江还远，所以说这句是既有方向性又有距离感并且是意向性的话。所以我们分析问题，千万不能把项羽所处的地理位置弄模糊了，更不能把这句话的实在语义弄错了。项羽此时是在东城，这一点必须明确记住。项羽是“欲”（要想）“东渡”，实际上还没有离开东城。因为一个“欲”字，不可能把项羽一下就转到了240里外的乌江。

三、乌江亭长舢舨船待，谓项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

这段文字，与上文明显矛盾。上文是说“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这话是说项羽自己想渡乌江，乌江亭长是顺着他的思路劝他速渡乌江。不料项羽却突然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说“天之亡我，我何渡为？”好像他根本没有想渡乌江，上文“欲东渡乌江”好像根本不是他的念头似的，文章前后明显的矛盾不接。这是矛盾之一。

“乌江亭长舢舨船待”，这句话让人产生错觉，好像乌江亭长和项羽都已经在江边渡口了。而实际上

项羽并未离开东城，也已不可能离开东城。所以这句话并非写实，乌江渡口离开东城还有240华里，乌江亭长怎么可能撬了船，跑到东城来接项羽呢？这是文章明显的纰漏。这是矛盾之二。

那末太史公的文章会有矛盾纰漏吗？有。这种矛盾纰漏前人早已指出。东汉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说：“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六朝宋裴骃《史记集解·序》说：“骃以为固之所言，世称其当。虽时有纰缪，实勒成一书，总其大较，信命世之宏才也。”近人李长之也说：“他在《史记》中根据已成的东西处是远超过于自己的摸索的。懂得这种情形，就不怪《史记》中风格之杂了，也不暇怪他偶尔有着矛盾了。”^[1]可见无论是古人或今人，都已经注意到《史记》的叙事中，是存在着“矛盾”和“纰缪”的，那末这种现象是怎样产生的呢？最早班固就指出：“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所以“甚多疏略，或有抵牾”^[2]。司马贞也说：“其属稿，先据《左氏》《国语》《系本》（按：即‘世本’。避李世民讳，改‘世’为‘系’）《战国策》《楚汉春秋》及诸子百家之书，而后贯穿经传，驰骋古今，错综隐括，各使成一国一家之事，故其意难究详矣。”他在《后序》里又说：“太史公之书，既上序轩、黄，中述战国，或得之于名山坏宅，或取之以旧俗风谣。故其残文断句，难究详矣。”^[3]近人李长之则说：司马迁著作的根据，大概不外是：“一、政府的档案，二、现成的书篇，三、父亲的旧稿，四、实际的见闻，五、自己的推断。”“懂得这种情形，……也不暇怪他偶尔有着矛盾了。”^[4]总之，“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与下文的“天之亡我，我何渡为”是前后矛盾的，而“乌江亭长檣船待”这句话并非实写，与当时所处的地理位置也完全不相符，所以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因此这句话是不足

为据的。

上文已经提到，司马迁写《史记》引用了前人很多的书，特别是《楚汉春秋》引用最多。《楚汉春秋》是陆贾所作，陆贾是刘邦同时人，《史记·陆贾列传》云：刘邦“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据近人金德建先生考证，这部《新语》，就是《楚汉春秋》^[5]。他还说：“陆贾当时著作这部《楚汉春秋》的原委，既然是要上奏于汉高祖的，所以他在史笔的叙次上就不免有好些地方要扬汉抑楚，以迎合高祖的心理。”按《楚汉春秋》已佚，今有辑逸本，载《丛书集成续编》。另有王利器先生辑本，载王著《新语校注》附录^[6]。我检辑本，如“沛公西入武关居于灊上，闭函谷关无纳项王”条，“项王在鸿门，亚父曰：吾使人望沛公，其气冲天，五采色相缪，或似龙，或似云，非人臣之气，可诛之。高祖会项羽，范增目羽，羽不应。樊哙杖盾撞入，食豕，羽壮之”条，“亚父碎玉斗”条，“项王为高阁置太公于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与项王约为兄弟，吾翁即汝翁，若烹汝翁，幸分我一杯羹’”条，“美人和项羽歌”条等，均见之于《项羽本纪》，文字当然有所不同。同样也可查到若干条见于《高祖本纪》。如“上过陈留酈生求见”条，“高祖向咸阳，南趣宛，宛坚守不下，乃匿其旌旗，人衔枚，马束口，龙举而翼奋，鸡未鸣，围宛城三匝，宛城降”条。还有若干条是《项羽本纪》《高祖本纪》共见的。所以从现今残存的《楚汉春秋》的文字来看，可以确信司马迁的《史记》是较多地采用《楚汉春秋》的文字的，当然在采用时有些条文字变动较多，有些条变动较少。可惜此书残缺太多，无法一一查对。如《楚汉春秋》除以上所举各条外，还保存着虞姬的和歌原文，而《项羽本纪》只说“歌数阕，美人和